

首页 → 研究方阵 → 蒙古族文学 → 古代经典

论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的文献特点和度藏形式

发布日期：1999-05-22 作者：白·特木尔巴根

【打印文章】

[内容提要]: 本文在总结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的源与流的关系及其繁荣发展的规律性特征的基础上, 从文献学角度对汉文创作进行了探析, 概括出迥异于蒙文书面创作的四个特点。并援引史料, 论述了汉文创作的三种主要度藏形式。

[关键词]: 蒙古文学; 汉文创作; 文献特点; 度藏形式

在元公12、13世纪, 蒙古民族以进入了文明阶段的游牧民族的雄姿崛起于世界历史舞台。蒙古文化作为典型的游牧文化, 一开始就以其开放性和兼容性著称于世。蒙古民族一方面积极吸收世界先进民族的文化和东西方文明, 另一方面又以其具有独特品性的文化影响了其他民族。蒙古文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一直保留了游牧文化的基本特性; 带有浓郁幻想神奇色彩的神话、尚武尚勇的英雄史诗等民间文学精品层出不穷; 深刻地反映了蒙古民族传统文化的品性。到了13世纪, 《元朝秘史》问世, 标志着蒙古文学由单纯的民间文学进入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并驾齐驱、各呈异彩的新阶段。这第一部书面文学作品以韵散结合的文体, 将历史与文学熔为一炉, 早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名篇巨制。从蒙古帝国肇基之初到清朝灭亡的1911年, 在长达700余年的历史时期, 蒙古文学受其所跨越的历史时代和社会客观环境的制约, 并在毗邻民族文化的影响下, 其书面文学创作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 即: 蒙古作家不仅使用蒙古文, 而且同时还使用汉文、藏文和满文进行文学创作[1], 以诸多民族文字的创作丰富了蒙古文学。这在世界其他游牧民族中实属罕见。据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对非本民族语言文字之创作产生的时间, 可作如下的归纳:

(1)汉文创作: 我们所搜集到的最早的汉文创作是13世纪末的诗歌和元曲。此后历经明代、清代, 数百年间汉文创作从未间断, 名流辈出, 创作丰赡, 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展示了蒙古文学的历史风貌。

(2)藏文创作: 据蒙古国科学院策·达木丁苏荣院士、德·元登博士、勒·呼日勒巴特尔博士、策·阿拉坦格日勒以及我国学者巴·格日勒图教授诸人的研究[2], 蒙古作家的藏文创作始于14世纪, 而大量的文学创作则伴随着黄教在蒙古地区盛行, 出现于16、17世纪的文坛, 并且持续到近代。

(3)满文创作: 据史料记载, 蒙古作家的满文创作始见于清朝中期, 由蒙、满语言教科书、文史典籍翻译转入文学创作。其文学文献在数量上较之汉文创作和藏文创作相差甚远, 难能与之匹敌。

在非本民族文字的创作中, 汉文创作先于其它文字的创作。究其原因, 既有政治上的功利目的所驱使, 也有历史文化上的渊源。早在蒙古帝国成立之前, 蒙古部落已开始从金国叛亡降附之臣习文书, “于金国往来, 都用汉字” [3]。到了蒙古帝国时期, 借用畏兀文创制了畏兀蒙文。同时, 又采取有力措施, 在蒙古人中培养汉语人才, “故太宗皇帝首诏国子通华言, 乃俾贵臣子弟18人先入就学。” [4]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 从加强统治的需要出发, 创制八思巴文, 用以拼写一切文字。定都中原, 招募儒士, 借鉴中原王朝的历史经验, 蒙古统治者在入主中原之初采取的这些举措都在客观上加速了汉语言文字在蒙古文人中的普及, 进而使他们达到运用自如的水平。

援据有元以来的史籍和文人著述, 我们可以考知蒙古作家在元代、明代和清代都曾创作有丰富的文学作品。若以年代划分, 最早的汉文创作分别是元至元年间伯颜丞相的诗歌、明洪武年间答禄与权的文集、清顺治年间孝庄文皇后的《皇太后祭大行皇帝文》和色冷的诗歌。历经三个朝代, 跨越数百年, 使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队伍逐渐发展到百数十人, 为我们留下了数十倍于蒙文书面创作的珍贵文献。

从纵向看, 元代与清代相隔近300年, 汉文创作随着更迭的时序自然形成了源与流的关系。从横向看, 元代和清代的汉文创作又与文化的大交汇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元代, 统治者 of 蒙古族, 由草原迁都大都(今北京)后, 蒙古官员、文人多集中于此, 其学习、使用汉文汉语的最初目的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汉文创作也就应运而生。在清代, 满族统治者一方面加速汉化, 于政务规复明代纪纲, 于文化则尊崇儒术; 另一方面明令禁止蒙古人习汉文汉语, 蒙古作家的汉文创作始终处于被禁锢之中。历史条件的变异没能使汉文创作消亡, 反而使它得以繁荣发展。促使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产生的决定性因素, 不是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人们的主观愿望, 而是外在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元、清两代的汉文创作作为一种以艺术作品形式出现的“客观化的意识”, 先后产生于多民族杂居的、相对统一和稳定的时空之内。这就是它的规律性特征。

文献是文学作品的最基本的存在形式之一。就历史上的蒙文书面创作而论, 多数作品与民间口头文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若《征

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故事》、《箭筒士阿尔嘎聪的传说》、《孤儿传》乃至《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等都是先以口头形式流传,嗣后由文人润色加工,或编入史籍,或抄缮刊刻,使其定型的。以《元朝秘史》为例,其为第一部书面文学作品无疑。然而该著作中有关蒙古祖先的传说、部落来历的传说、祝赞词、歌词等都有着颇为鲜明的民间文学特征。其中一些传说尚带有原始思维的深刻烙印,较之《元朝秘史》成书的那个时代尤为远古。17世纪历史文学名著,如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罗卜桑丹津的《黄金史》与《元朝秘史》颇为相似。截止于近代的蒙文书面创作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与民间口头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从民间文学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甚至直接引录了民间创作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它取材于蒙古民众的生活,又流传于蒙古民间。似乎可以说,蒙文书面文学是蒙古民众与蒙古文人的共同创作。从文献角度讲,绝大多数蒙文书面创作经历了由口头传承到文献记载的过程,直接以文本形式出现的创作为数不多。19世纪中叶,尹湛纳希的章回体小说《青史演义》、《一层楼》和《泣红亭》及其他文人创作的大量出现,才使得蒙文书面创作开始截然独立于民间口头创作;作家的创作风格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古代蒙古作家的汉文创作则不然。综观流传到今天的文学文献,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四个特点:

其一,它直接以书面文学的形式出现,纯属文人创作。

其二,惟其在初始既径直采用汉族古典文学的传统文体,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予以增益和完善,因而与蒙古文学的主流——蒙文创作比较而言,其体裁以多样性见长。

其三,自13世纪出现的汉文创作,直至20世纪初从未间断,数百年的风云变幻,世态民情,及其作家的个人意绪,都在这些创作中得以描绘和抒发,因而其内容较之蒙文创作又以丰富性更胜一筹。

其四,汉文创作是蒙古族作家接受农耕文化影响的产物。作为文学文献,其版刻、流传和度藏形式都带有农耕文化的特点,与植根于游牧生活的蒙文创作迥然不同。汉文创作大都产生于都市或定居区,相对统一和稳定的局面不仅繁荣了汉文创作,也使其得以广泛流传和妥善保存。都市或定居区有着雕版印刷的优越条件,文人易于聚首,切磋可期旦夕,典籍诗书或度藏金匱石室,或插架翰苑书斋,风雅之士竞相钞存,坊间贾者集资翻刻,古代蒙古作家的汉文创作较之蒙文创作可谓其流传也广,保存也善。

上述四个特点是相对于蒙文书面创作而言的。单就文献研究论之,它涉及到版刻、流传等诸多方面,而所有这些最终又要归结于文献的度藏。文献研究之所以注重从目录学入手,探究各类文献之度藏,其道理端在于此。

请继续浏览: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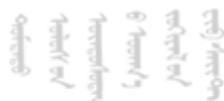
文章来源:《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 \(http://www.iel.org.cn\)](http://www.iel.org.cn) ”。

专题 [古代文学](#) 的相关文章

- 梳理金元文脉 突出遗山主峰
- 中国辽金文学国际学术论坛综述
- 试谈《萨迦格言》的辩证法思想
- 元代蒙古文化泰斗孛思吉斡节儿
- [薛克翘]读《西藏王臣记》

中国民族文学网



ᠴᠢᠨᠠ ᠨᠠᠭᠤ ᠯᠢᠷᠢᠨ ᠠᠨᠠᠭᠤ ᠨᠠᠭᠤ

چۇڭگو مىللەتلەر ئەدەبىياتى تورى

Curggoz Minzcuz Vwnzyoz Muengx